

周作人

伟大的捕风

Weida De Bufeng
——Zhouzuoren Sanwen FankangXing Yanjiu

——周作人散文反抗性研究

朱晓江 著

伟大的捕风：周作人散文反抗性研究

朱晓江·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伟大的捕风——周作人散文反抗性研究/朱晓江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1
(“薪传”现代文学研究平台系列)

ISBN 978-7-309-10849-1

I. 伟… II. 朱… III. 周作人(1885~1967)-散文-文学研究 IV. I207.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2145号

伟大的捕风——周作人散文反抗性研究

朱晓江 著

责任编辑/郑越文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75 字数 197千

2015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0849-1/I·855

定价: 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2006年,教育部批准聘任王德威为复旦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领衔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我想说,这是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时刻。它对于提升我们学科的品质,加强国际学术对话和交流,创建一流学科,直接起了推动的作用。

我只想举几个例子,说明德威兄对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贡献。2007年春,德威兄到任以后,着手筹备一系列有影响有质量的国际学术会议。2008年6月,哈佛大学东亚系、复旦大学中文系等单位联合举办“海外中国现代文学教材教学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和讨论了海外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与教材建设,这是一个历来被人疏忽、又能够引起许多话题的主题,给人的启发可以想见;10月,复旦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张新颖、张业松、严峰、李楠等教师应邀赴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参加“呈现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德威兄的精心安排下对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威斯理学院等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以集体的形象展示于国际同行的面前;2009年1月,哈佛大学东亚系、台湾“中研院”、复旦大学古代文学中心联合举办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外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重要学者都参加了会议;3月,哈佛大学东亚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和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在香港联合举办“中国当

代文学 60 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作家王蒙、王安忆、朱天文、北岛、黄春明、严歌苓、平路、钟晓阳等出席了会议，成为香港学术界一件盛事；2010 年 6 月，哈佛大学东亚系和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文艺出版集团等单位联合举办“新世纪文学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的哈佛中心和复旦大学举行，邀请了王安忆、莫言、余华、苏童、骆以军等知名作家和一批年轻作家同登讲堂，商量探讨新世纪十年的文学，会上高潮迭起，新见纷纭，直接推动了新世纪文学的研究……这些学术活动都有许多重要学者参与研讨，而德威兄是这些学术活动的灵魂，从策划主题到组织人员，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不仅如此，他把长江学者的科研经费完全地奉献出来，用于补贴会议费用和邀请复旦教师出国之用；还不仅如此，每次学术活动中，他都带头发表新的学术论文，以卓越见解引领学术前沿风气……身为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的讲座教授，美国、中国学术论坛上的重要活动家，跨华、英两种语言著述领域新作不断的学者，自身工作的繁忙可以想象，但一旦承诺了复旦大学的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之岗位，就以如此精力投入经营，苦心扶植、提携后学。我作为协助他工作的合作者，愿意把这种感动公布出来，不仅仅是为了表彰，更重要的是，德威兄为当代学术界确立了一种人格风范，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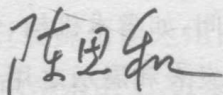
在德威兄的带动下，许多海外的青年学者与复旦的联系也紧密起来，由此展开了多元的校际交流和系际交流，复旦中文系先后与美国的威斯理学院、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等学院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学者的往来逐年增多。多年来，复旦中文系一贯执行鼓励研究生外出深造的方针，许多在美国攻读学位的复旦学子脱颖而出，他们始终与母校保持了亲密联系，随时交流、参与复旦中文系的各种活动。他们在海外做出的学术贡献，同样也显现了母校的根基培育之果。

这几年来，复旦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同事们一如既往地发奋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述,在积极展开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视野渐宽、新见频发,积累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三年中,除了个人出版的学术著作以外,我们还先后编辑出版了复旦师生现代文学研究的集体成果“薪传”丛编四种、国家社科项目“20世纪文学史理论创新丛书”五种,都反映了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整体风貌的学术成果。自德威兄担任了复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以来,我一直想再策划一套新的学术丛书,扩大原来著述范围,以体现跨国合作的广阔视野,反映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新的学术面貌。于是,我冒昧提出一个“平台”的理念。平台一般只是指高于附近区域的平面,一个广阔但有范围的空间,现在常用在比较抽象的学科建设领域,指的是某种学科发展的空间,如学术机构、学术活动、论坛、刊物,等等,供学术成果的公开发表和展示之用。依我的理解,丛书本身不是平台,而是在德威兄引领风气之下,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研究空间扩大了,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国际交流和学术会议,由此又引出新的讨论话题和新的研究成果,这些整体的学术发展过程都体现了“平台”所展示的实绩。

新的平台丛书目前还只是一个设想,要实现这个设想恐怕还要好几年的时间。我们不打算事先策划什么主题,只想提供一个平台,吸引更多的著作者来自由加入。作者的队伍有所扩大,不仅仅是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同仁,也包括在复旦中文系学习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包括曾经在复旦中文系学习过、而今在各自岗位从事研究的学者,还包括从复旦到国外去留学攻读学位、而今在海外高校里工作的学者,也包括在复旦中文系兼任过各类教职、上过系列课程的海外汉学学者,从一个比较宽泛的角度来体现复旦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丛书的内容和主题设计方面别无要求,唯一的要求就是必须是新完成的学术著作,而不是旧著的重版或变相重版;时间上也没有特别催促的意思,希望成熟一本推出一本,慢慢地积累数量,渐渐地形成规模。

2007年,在“薪传”丛编出版时,我写过一篇序,文章中说:“希望将‘薪传’作为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学术研究成果的总称。……传统就是一道水流,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水底的石头,传统的水流浸漫我们,滋润我们,又带走了我们生命中的信息,传布开去。复旦现当代文学学科是由前辈学者辛苦开创而成,我们应该发扬光大其传统,继往开来,代代承传。所以,‘薪传’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关键词。”现在,我把这套平台丛书同样纳入“薪传”系列,也就是想再强调一遍:薪传,是我们的关键词。



2010年11月10日临晨,

写于香港城市大学德智苑

目 录

第一章	“新文学”与“新文明”：周作人散文的“反抗性”特征及其思想内涵	1
一	引言：“文学是不革命，然而原来是反抗的”	2
二	“以虚无之物为上古之方舟”：超越于“质体”的“精神”张皇说	9
三	“人的文学”：“只能说时代，不能分中外”的“人类共同的运命”	23
四	“人类正当生活”的追求：“新文明”视野下散文反抗性的内涵及其展开	35
第二章	“美文”：“闲适”背后的文明批评	45
一	问题的提出：为什么提倡“美文”？	46
二	视野的拓展：日本“新文学”与中国“新文学”	49
三	“颓废”的风格：“美文”写作与现代性反思	59
四	“生活之艺术”：“建造中国的新文明”	66
第三章	从“文体革新”到“思想革命”：小品文观念的转折及其文化意蕴	79
一	“传统”：一个全息的文化概念	80
二	“小品文”的转折：从“文体”借鉴到“文学史”考察	83
三	现实的指向：在“革命文学”的参照下	93
第四章	“时事之文”：“时事”与“文明”的双重观照	109
一	“思想自由”与“宽容”：“非宗教运动”的出发点	113
二	“种业”视野下的“时事”：关于“清室优待问题”的议论	121
三	知识分子的分化与责任：从“女师大”事件到“三·一八”惨案	128
四	“故鬼重来”：从“时事”转向“历史”	142
第五章	“笔记体散文”：从“历史的批评”进入“文明的批评”	153

一 “时文”与“策论”：周作人的中国知识分子批评	158
二 “消极”抑或“积极”：知识分子民间岗位意识的 确立与确认	175
三 “圣像破坏”与“秩序重建”：对“妇女问题”的关注	181
四 “消解种业”与“文明更生”：打破历史的循环	188
五 “物理”与“人情”：“常识”的普及与散文写作	200
结语 “遗民”心态与散文反抗性的消退	209
参考文献	217
后记	230

第一章 “新文学”与“新文明”： 周作人散文的“反抗性” 特征及其思想内涵

一 引言：“文学是不革命，然而原来是反抗的”

1928年11月22日，周作人借给俞平伯《燕知草》写《跋》的机会，表达了他对于晚明小品文与现代“新散文”的看法：

……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有些人终于做了忠臣，如王谑庵到复马士英的时候便有“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的话，大多数的真正文人的反礼教的态度也很显然，这个统系我相信到了李笠翁袁子才还没有全绝，虽然他们已都变成了清客了。……我常想，文学即是不革命，能革命就不必需要文学及其他种种艺术或宗教，因为他已有了他的世界了；接着吻的嘴不再要唱歌。这理由正是一致。……文学是不革命，然而原来是反抗的：这在明朝小品文是如此，在现代的新散文亦是如此。^①

虽然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的“小品散文之王”，^②但有味的是，周作人上述关于晚明小品文与现代新散文的认识，即内蕴于散文之中的反抗特性，并没有广泛地为阅读界与评论界所注意；

① 周作人《〈燕知草〉跋》，收止庵校订周作人自编文集《苦雨斋序跋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24页，以下引该自编文集时只标注文集名与页码。又，本书引用的周作人散文共计两种，一是周的自编文集，二是钟叔河编订的《周作人散文全集》。以下，凡周氏自编文集中收录的文字，皆依自编文集引用；自编文集以外的文字，则依《周作人散文全集》引用，特此说明。

② 苏雪林在《周作人先生研究》（1934年）一文中认为，“最近十年内‘小品散文之王’的头衔，我想只有他才能受之而无愧的”。收陶明志编《周作人论》，北新书局，1934年12月初版，第238页。

不但没有引起注意,相反,周氏本人的散文作品,也普遍地被纳入到了一个离他本人的言说相去甚远的文化语境中来加以讨论——将其散文风格简约地概括为“平淡”或“闲适”,即是这一倾向的典型表征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化约了周氏散文独特的文化指向,也是他所不能同意的。1936年9月2日,周作人写就《自己的文章》一文,其中说:

有人好意地说我的文章写得平淡,我听了很觉得喜欢但也很惶恐。平淡,这是我所最缺少的,虽然也原是我的理想,而事实上绝没有能够做到一分毫,盖凡理想本来即其所最缺少而不能做到者也。现在写文章自然不能再讲什么义法格调,思想实在是很重要的,思想要充实已难,要表现得好更大难了,所有的只有焦躁,这说得好听一点是积极,但其不能写成好文章来反正总是一样。……又或有人改换名目称之曰闲适,意思是表示不赞成,其实在这里也是说得不对的。……闲适不是一件容易学的事情,不佞安得混冒,自己查看文章,即流连光景且不易得,文章底下的焦躁总要露出头来,然则闲适亦只是我的一点理想而已,而理想之不能做到如上文所说又是当然的事也。

看自己的文章,假如这里边有一点好处,我想只可以说在于未能平淡闲适处,即其文字多是道德的。……朋友们称之曰平淡或闲适而赐以称许或嘲骂,原是随意,但都不很对,盖不佞以为自己的文章的好处或不好处全不在此也。^①

然而,只要我们稍稍翻读周作人的文集,就会发现,如果仅从文章的外在风格来看,那么他的散文,至少有一部分如《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娱园》《吃茶》等,是确可以用“平淡”、“闲适”来加以描述的;而周作人在1920年代早期,也曾经追求过一种“平

① 周作人《自己的文章》,《瓜豆集》,第170—173页。

淡自然”的文章风格。^①这样,当周氏在1930年代竭力将自己的文章与“平淡”、“闲适”一类的风格描述区别开来时,这样一种表述的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②

中国现代小品散文的写作与出版,在1934年前后达到一个高潮,^③这和林语堂相继创办《论语》《人间世》杂志,以及此后类似杂志,尤其是《宇宙风》的风行不无关系。由此,1930年代中国的阅读界(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了迄今为止的学术界)在讨论小品文的文体特征与文化功能时,大都以林语堂关于小品文的论述为范型,其倾向通常以小品文为闲适、性灵文学。^④林语堂的小品文观念以晚明公安派的“性灵说”为框架,参以西方浪漫主义以来文学“抒情的”、“个人的”趋向,提倡“性灵”与“趣味”,其关注大半在于个人情致的挥发,而其极致的表述即是《人间世》。

① 在《雨天的书·自序二》(1925年)中,周作人即说:“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1926年,在《艺术与生活·自序》中,周作人亦说:“在现今这种心情之下,长篇大约是不想写了,所以说这本书是我唯一的长篇的论文集亦未始不可。我以后想只作随笔了。”此处“随笔”与“长篇论文”相对,指的是一种抒情的美文,其文体的美学风致中也含有对“平淡自然”的追求。

② 止庵在校订周作人的自编文集时也曾讨论过周作人散文的“闲适”问题。在《关于〈雨天的书〉》中,他认为:“……这里所涉及的两个方面,一是作者写文章时所持态度,一是某些文章的具体内容,似乎统可以‘闲适’一词来概括,二者却有很大区别。如果从态度考虑,周氏此后几乎所有文章都是如此,不过各个时期作品的色调与韵味有所不同罢了。从内容考虑,真正的闲适小品只占全部创作中很少的一部分。”将“写文章时所持态度”与“文章的具体内容”区别开来分析,止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从这一个思路理解,我们未尝不可以说,在许多场合,“闲适”其实只是周作人散文披着的一件外衣,在“闲适”的底下,作者其实别有其文化上的指向;而即便是《北京的茶食》这一类的“美文”,假如我们将其放置到周作人对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反思中来加以考察,那么,它内蕴的反抗性特征,也是明显的。此点本文第二章将作详细讨论,此处不展开。引文见止庵校订周作人《雨天的书》之整理前言《关于〈雨天的书〉》,第2—3页。

③ 在文学界,1934年被称作是“小品文年”。有关这一时期中国小品文的情况,可以参阅陈望道编《小品文和漫画》(生活书店,1935年)、李素伯《小品文研究》(新中国书局,1932年)等著作。

④ 如伯韩在《由雅人小品到俗人小品》一文中说:“一看到小品两个字,就觉得有几分名士气的模样”,“不论是旧的传统,是新的传染,总之小品文这东西,还没有完全脱离消遣物的意味。”唐弢在《小品文拉杂谈》一文中也说,“自从《人间世》创刊以后,主编者以为小品文当以自我为中心,闲适为格调。于是违反这二个条例的短文章,就仿佛变做弃婴,给摒绝于小品圈外了。”引文见陈望道编《小品文和漫画》,生活书店,1935年,第3—6、49页。

发刊词》中的“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一语。^①这是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现代演化，原也隐含了文学对于文化道统的反抗，但林氏本人的理论阐述与创作，后来却很少在这一方面用力，而过于放大了中国文人传统中的“闲适”理念。^②这就使他的文艺思想及创作“趣味”有余，而缺乏一种思想上的社会参与，因而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思想/文化主题相距颇远；其在文化上的功能，亦确如一些评论者所批评的，带有中国传统文人的名士气，而富于文化消遣的意味。^③在这样的文化指向下，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鲁迅将小品文看作是“美术上的‘小摆设’”，认

① 关于林语堂的文艺思想参阅《论文》《人间世·发刊词》等文。《人间世·发刊词》的原文是：“盖小品文，可以发挥议论，可以畅泄衷情，可以摹绘人情，可以形容世故，可以札记琐屑，可以谈天说地，本无范围，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与各体别，西方文学所谓个人笔调是也。”载《人间世》第1期，1934年4月5日。

② 在这一方面，林语堂典型的作品其实是《苏东坡传》《吾国与吾民》等专著，此二著集中传达了他对于中国文人传统中的“艺术生活”的理解与欣赏；而散文方面的代表则有《言志篇》（收《我的话》上册）等。此外另有一件小事值得玩味。根据鲁迅1934年8月13日致曹聚仁的信，“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鲁迅“曾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引文见《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505—506页）施建伟在解读此事时认为：“鲁迅的思维中心是希望林语堂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而这时的林语堂的思维中心已转移到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两者相去甚远。”严格地讲，林语堂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是在1936年出国以后，但施的解读仍很有见地；而林氏眼中的中国文化，则大半以道家文化思想为核心，重“趣味”，重“闲适”。由这一点，我们其实也可以从侧面加深对林氏文艺立场的理解。施建伟《林语堂出国以后》，原载《文汇月刊》1989年7月号，收林语堂《八十自叙》之附录二，宝文堂书店，1990年1月第1版，第147页。

③ 在这一方面，除了上引伯韩、唐弢的言论外，陈醉云的观点也很有代表性。在《小品文往哪儿走》一文中，作者这样评点现代小品散文盛行的原因：“在这机械化的时代，世人多以高速率来生产，高速率来消费，同时也用着高速率来享乐或求知”，“……可是现在，经济状况发生变动，这些人多被迫着离家去乡，不得不东奔西走的去找事做，生活既不安定，时间亦感局促；为了满足其趣味与求知起见，报纸便成了恩物，而‘副刊’中的短文字，也就自然而然的替代了那些长篇说部。小品文渐次盛行，这是一个原因。”从“机械的时代”出发来讨论小品散文的文化意义，隐约地已含有现代性反思的思想品格，但从快速率的社会节奏出发来理解小品文的功能，实际上也还是将小品散文看作是消遣一类的文化读物。引文见陈望道编《小品文和漫画》，第53页。

为它是“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①也就不是无的放矢的议论了。

周作人将自己的散文风格从“平淡”、“闲适”的描述中解脱出来的原因，当然不是因为左翼作家包括鲁迅的批评。^② 鲁迅要求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③强调的是文学和时代危机/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对此，周作人已在“文学是不革命”、“教训之无用”等立场下，与之保持了距离。这种差别显而易见。由此，周作人对自己散文风格的描述，其动因毋宁说是在于，他想要将自己的散文与那些在外界看来是与他处于同一阵营之中的作家区别开来，即他对于小品文的理解，和林语堂们的观点，并不一致。1965年4月21日，在给鲍耀明的信中，知堂直言：“语堂系是旧友，但他的眼光也只是皮毛，他说后来专抄古书，不发表意见，此与说我是‘文抄公’者正是一样的看法，没有意见怎么抄法，……不过我不愿意直说。”^④这段文字最好地表明了周、林之间的差异。^⑤ 所谓“他的眼光也只是皮毛”，固然可以理解为林氏未能读懂周氏散文背后的思想企图，

① 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第575页。

② 在《关于写文章》（1935年）一文中，周作人即在文学“无一点教训的效力”的前提下，说“眼看文章不能改变社会，于是门类分别出来了，那一种不积极而无益于社会者都是‘小摆设’，其有用的呢，没有名字不好叫，我想或者称作‘祭器’罢。祭器放在祭坛上，在与祭者看去实在是颇庄严的，不过其祝或诅的功效是别一问题外，祭器这东西到底还是一种摆设，只是大一点罢了。”这可以看作是周作人对鲁迅批评的回应。引文见《苦茶随笔》，第170页。

③ 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第576—577页。

④ 鲍耀明编《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386页。

⑤ 周木斋是当时少有的注意到周、林之间差别的学者之一。他在《小品文杂说》一文中即明确指出，“作为知堂先生一派，沿袭他的理论而想加以发扬光大的林语堂先生，其实是了解而又不了解知堂先生的特殊小品文体的。”引文见陈望道编《小品文和漫画》，第20页。此外，近来学术界也已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点。郅元宝在《从“美文”到“杂文”——周作人散文论述诸概念辨析》（载《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1、2期）一文中辨析了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提出的“在林语堂的圈子里，周作人是首屈一指的小品文家”一类的观点，认为夏氏“把周作人林语堂不加区别”，将周作人缩小塞进林语堂的圈子里，“实在不妥”。所辨甚是。刘绪源《解读周作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之第一章《苦雨斋与同时代的散文家》一文亦区别了周作人与林语堂、梁实秋、丰子恺等作家之间的散文风格，可以参读。

同时也可以延展到他对林氏小品文观点的批评,即对于一种纯粹以文学“趣味”为终极追求的文学理念的否弃。在周作人,文学固然是“不革命”,但同时也还是“反抗的”。离开这一“反抗”的特性而大谈文学的“趣味”或“平淡”、“闲适”,势必将其拉向文学消遣的层面。这与他的文学观念相距甚远。在此,我们不妨回顾1921年由他执笔撰写的《文学研究会宣言》:“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①这虽然是一份集体的宣言,而此后他在文艺问题上的看法也多有转折,但《宣言》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严肃的文学观念,终周作人一生,都是有效的——对周作人来说,文学虽然不直接地承担解除时代危机的责任,但仍然是有关于“人心世道”的事情。这也正是他说自己的文章“多是道德的”的原因所在。落实到小品散文,他对晚明小品文的表彰,着眼点其实并不在于小品文的“趣味”或者传统文人的才情,^②而是从晚明的文人及其思想、活动中,看出了对抗“道统”的“反抗”意味;而这样一种“反抗性”,无论它是强调张扬个性、王纲解纽,或是主张文学上的反对模仿,都可以作为现代“思想革命”的先声来加以考察。这样,当他将自己的散文风格与时尚风行的“闲适”说区别开来的时候,内在隐含的,应该是他对于流行的小品文观念的不满。^③对周作人来说,他的散文写作别有文化上的

① 参见由周作人执笔的《文学研究会宣言》,收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第296页。以下引用该文集时只标注卷数与页码。

② 关于这一点,废名为对周作人的认识,即比林语堂的看法要真切。在《关于派别》一文中,废名认为:“林语堂先生在《人间世》二十二期《小品文之遗绪》一文里说知堂先生是今日之公安,私见窃不能与林先生同。据我想,知堂先生恐不是辞章一派,还当于别处去求之”,“我觉得知堂先生的文章同公安诸人不是一个笔调,知堂先生没有那些文采,兴酣笔落的情形我想是没有的,而此却是公安及其他古今才士的特色。”原载1935年4月20日《人间世》第26期,此据孙郁、黄乔生主编“回望周作人”之《研究述评》,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34、36页。

③ 而事实上,就在“小品文”流行之际,周作人已基本放弃了“小品文”一词的用法——无论它是用以指称自己那些内容庞杂的散文,或是以此概括文学史上的某一文类。一个典型的案例是,1930年9月21日在为沈启无编的明清散文选集写序时,其题名作《〈冰雪小品选〉序》;近两年后的1932年9月6日,在为同一本书写新序时,题名已改作《〈近代散文抄〉新序》,而原序在收入《苦雨斋序跋文》时,亦改作《〈近代散文抄〉序》。以“近代散文”取代“冰雪小品”,其中的意味值得玩味。

抱负。这种抱负在写于1944年12月5日的《文坛之外》一文中，有更进一步的申说：

鄙人自己估计所写的文章大半是讲道德的，虽然平常极不喜欢道学家，而思想的倾向乃终无法变更，即欲不承认为儒家而不可得，……所可喜者，这所讲的道德乃是儒家的正统，本于物理人情，其正确超出道学家群之上，要照旧话来说，于人心世道不是没有关系的事。……孔子的教训（引者按，即指“知之为之”一章）使我学得了九十分以上的谦虚，同时却也造成了二三分的顽固，即对于有些问题的不客气或不让。自己知道一点的事情，愿意公之于人，只要不为名利，其所言者有利人群，虽或未能比诸法施，薪火相传，不知其尽，亦是有意思的事，学人著书的究极目的大概即在于此。又或以己所知，照视世间种种言说行事，显然多是歪曲误谬，有如持灯照暗隙，灯光所及，遂尔破暗，则匡谬正俗实为当然之结果，虽不好辩，亦岂可得。鄙人于积极的著书立言之事犹病未能，唯平日鉴于乌烟瘴气充塞中国，深觉气闷，读吾乡王仲任遗书，对于他的疾虚妄的精神非常佩服，仿佛找着了一条道路，向着这方向如能走到一步是一步，虽然原是蜗牛上竹竿，不知道能够进得多少，但既是想这样做，则纵欲学为多点头少说话，南辕而北辙，殆不可能矣。^①

尽管有学者认为，这是周氏在抗战后期为塑造其“自我”形象而写的文字之一，^②但对照30年代抗战以前周作人的散文写

① 周作人《文坛之外》，《立春以前》，第163—164页。

② 钱理群在其《周作人传》的第八章第六节“道义事功化”中谈到了周作人在抗战后期的自我形象塑造问题，认为“就在这样复杂、微妙，连周作人自己也未必明确意识到的心理背景下，他终于求助于‘伦理的自然化’与‘道义的事功化’这类传统的道德观念、评价标准，以此来解释、说明、评价自己的一切作为，周作人于是又塑造出了一个新的‘自我’形象”，“现在已经有了三个‘周作人’：一是‘伪官吏’的‘周督办’，一是‘寻梦者’的苦住庵庵主：这都是实有的周作人。还有（转下页）”